



中国史专题讨论丛书

清代人物研究

戴逸 罗明 编著

巴蜀书社

中国史专题讨论丛书

清代人物研究

戴逸 罗明 编著



巴蜀书社

一九九二年·成都

(川)新登字008号

责任编辑:梅锦辉

清代人物研究

戴逸罗明编著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7.5 字数400千

1992年9月第一版

1992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690册

ISBN7-80523-409-4/K·85

定价:9.10元

出版说明

建国三十多年来，我国史学界对中国史上的许多重大课题展开了研究和讨论。随着历史学研究的日益活跃与深入，史学界很多同志特别是广大中青年同志，迫切要求对三十多年来对许多方面的研究与讨论情况能有个较全面的了解，以便研究工作的继续深入。为了满足史学界的这种要求，也为了给今后的史学工作者保留一套较完整的中国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中国史专题讨论丛书》。

这套丛书大致分为史学总论、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至一九一九年）三大类，每类又分为若干专题，按专题分册出版。每种专题分册又由三个部分组成：专题研究的概述、重要论文选编、论著目录。概述与编选都以专题讨论为中心，兼顾有关的研究成果，力求做到全面、准确、客观地反映已有的研究水平。编者对某些学术问题的评价和看法，不代表编委会的意见。

丛书编委会由李侃、林言椒、王庆成、陈高华、袁庭栋五人组成，李侃为主编，林言椒、袁庭栋为副主编。工作机构设在《中国历史学年鉴》编辑部。

由于我们对编辑这类书籍缺乏经验，诚恳地希望广大读者和史学界同行提出建议和批评指教。

中国史学会《中国历史学年鉴》编辑部
巴 蜀 书 社

目 录

建国以来清代人物研究概述·····	罗 明 高 翔 (1)
建国以来清代人物研究论文选·····	
简评努尔哈赤·····	周远廉 (85)
努尔哈赤及其时代·····	赵德贵 (103)
论皇太极·····	金成基 (119)
略论皇太极的历史作用·····	陈克进 滕绍箴 (148)
皇太极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王思治 (160)
评多尔衮·····	金成基 (180)
论多尔衮摄政之历史的和个人的条件·····	陈作荣 (214)
试论多尔衮在清初统一中国过程中的历史作用 ·····	郑克晟 (225)
论康熙·····	刘大年 (239)
论康熙的历史地位 ——对刘大年同志《论康熙》一文的商榷 ·····	袁良义 (268)
康熙朝的储位之争和胤禛的胜利·····	冯尔康 (295)
论清世宗·····	樊树志 (323)
清世宗夺嫡考实·····	王钟翰 (341)
雍正评议·····	林毓辉 史 松 (401)

乾隆初政和“宽严相济”的统治方针·····	戴 逸 (435)
从避暑山庄谈到乾隆皇帝·····	罗 明 (456)
清代人物研究论文索引(1950——1986)·····	(470)
后 记·····	(554)

建国以来清代人物研究概述

罗 明 高 翔

一、总 论

历史是由人的活动、人的选择构成的。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每一个人，无论是驰骋沙场的将士，还是男耕女织的农夫，无论是高高在上的皇室贵胄，还是赏风吟月的文人墨客，都扮演着一定的历史角色。正是历史人物的活动和选择，以及这些活动和选择间的相互作用与碰撞，构成了五彩缤纷，波澜壮阔的人类历史。因此，如果历史学家要真正理解一个时代，就必须对该时代历史舞台上的主要角色有一个全面的准确了解，从这个角度讲，人物研究是历史科学的重要基础之一。

谈到人物研究，我们认为就其主要内容和终极目的而言，可以简化为以下两个问题：第一是回答历史人物曾经作过什么样的活动和选择；第二是回答这些活动和选择产生过什么样的历史效果。换言之，人物研究就是要求史学工作者搞清研究对象是怎样一个人，并对其历史地位作出公允的评价。

其中，第一个问题是人物研究的基础，它要求研究者弄清与研究对象有关的一切重要环境与事件。要做到这一点，困难不少。历史人物，尤其是古代人物，距今久远，有关资料往往残缺

不全，或记载模糊，而且大多过于简单。这种情形颇似十九世纪英国作家查尔斯·理德的描述：“反映（历史人物）原始的真实情况的史料对于普通人来说仍然是废纸一堆，因为记载史料的人留下了许多东西要靠人们的想象力来填补”（《患难与忠诚》，第1页）。在这种条件下工作，史学工作者就必须具有明晰的判断能力、深厚的史学修养和严谨的治学态度。

人物研究的第二个问题就其实质来说，就是人物评价问题，这是高层次的史学思维活动，要求研究者要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和综合判断能力。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史学工作者必须对研究对象所处的时代、环境有一个全面正确的理解，同时还要掌握其生平及主要历史活动，此外，在评判过程中，研究者还应该保持冷静、理智、不带偏见的科学态度。

总之，历史人物研究是非常复杂的史学活动，黑格尔曾指出：“人们总是很容易把我们所熟悉的东西加到古人身上去，改变了古人。……”（《哲学演讲录》第1卷，三联书店57年版第112页），而要避免研究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错误，就要求我们在求实精神指导下，立足史实，用辛勤的劳动，还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并对其功过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在这里，求实精神就是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对历史人物负责的精神，“青史凭谁定是非”，史学工作者不可不慎重为之。

在谈到历史时，李大钊曾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在这里，他把现时代看成过去通向未来的桥梁。

面人类理解、分析自己生活形式的方式，则如马克思所说：“总是采取同实际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

说，是从发展过程完成的结果开始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2页）

如果我们站在现时代的高度，回过头去，纵观数千年中国历史之演变，不难发现，清代，正是中国由古代通向近代的桥梁。数千年传统文化在这个时期发展、凝聚，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崭新的西方文明也在这个时期或伴着《圣经》，或乘坐商船，或假以炮舰，缓缓流向中国，频敲天朝大门，日积月累，渐臻深入，最终酿成十九世纪中叶的“千古未有之奇变”。

因此，1840年前两百年清代历史，决不是一般的封建王朝史，它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占有特殊地位。从这里，向上可以寻求儒家文化的真谛，追溯封建社会的兴衰，向下，可以观察中西文化的冲突，探索古今之变的历史规律。此外，“清代武功文治，幅员人才，皆有可观”。因此，“史学上清史，自当占中国累朝史中较盛一朝，不应故为贬抑，自失学者态度”（孟森《清史讲义》第1章）。所以，近年来，清史研究（包括人物研究）蓬勃发展，日臻兴旺，决不是简单的偶然现象。

当然，近代对清代人物的研究并非始于建国以后，它可以追溯到民国初年。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以后，编修《清史》就提上了日程。在此前后，关于清人的笔记、传闻、野史大量出现，如《春冰室野乘》、《清帝外纪》、《清代名人轶事》、《清外史》、《清代野记》等等，种类繁多，不胜枚举。不过，这些多属资料性质。需要注意的是，当时，有的作者或是出于政治偏见，或是迎合市民趣味，对清代人物，有关记载频有失实之处，甚至，津津乐道于宫闱之事。因此，对这个时期出版的清人材料，尤其应当持慎重态度。

整个民国时期，清史研究都处于草创阶段。有分量的成果并不很多，清代历史人物研究也不例外。值得一提的是《清史稿》本纪和列传部分。尽管该书问题不少，但毕竟第一次对三百年清代著名人物作了一个系统介绍，而且所记史实均有所本，“其取材则以实录为主，兼采国史旧志及本传，而参以各种记载，与夫征访所得，务求传信，不尚文饰焉”（金梁：《清史稿校刻记》）。它不仅促进了时人对清史的了解，而且许多地方至今仍不乏参考价值。但是，它的缺失也是极其明显的，疏漏脱略、排比失当，错误比比皆是，令研究清史者不敢据为信史。

民国时，清代人物研究成就最大的学者是孟森先生。他是清史学界著名前辈之一。虽系旧型史学家，但他对一些清代人物生平事迹的考订在今天看来还是颇有成就的。如对清太祖努尔哈赤，他就对其起兵、杀弟及与明朝关系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作过详细考证，对澄清当时历史事实很有帮助。

全国解放以后，清代人物研究有了很大发展。这可以从纵、横两方面来考察。

从纵向来看，从1950年到1986年的36年间，清代人物研究可以说经历了两次飞跃。

第一次飞跃发生在五十年代初。通过这次飞跃，结束了唯心主义历史观对清史研究的指导，确立了唯物主义观点、方法的主导地位。人们开始用新的阶级分析的方法重新审视、研究清代人物，人们已不满足于对历史活动直接动因的分析，而是开始探索隐藏在这些动因后而的阶级根源。马克思主义给当时清代人物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促使人们探讨一些新的领域，并对一些历史人物进行重新评价。例如，对史可法究竟是民族英雄还是民族败

类的争论，就反映了人们在新的理论指导下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认识。

五十年代初清代人物研究的飞跃，主要是研究理论、观点和方法上的更新，它虽然导致了研究者世界观的转变，但并没有造成清代人物研究的繁荣。究其原因，除了众所周知的“双百”方针长期未能贯彻，不断的政治运动干扰学术研究外，还有以下几点：

一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解的教条化倾向：恩格斯曾指出：“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末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72页）。建国后相当一段时期，和学术界其它领域一样，清代人物研究也存在着教条化倾向。例如，由于机械照搬阶级分析方法，在人物评价中，存在着不恰当的倾向性，过分强调历史人物的阶级归属，用简单的贴标签的方法代替艰苦的深入的研究。

第二、与教条化倾向相适应的是把历史人物模式化。研究者奉献出来的成果，往往反映不出历史人物复杂多样的个性特征，而是互为雷同、千人一面。例如，不论何时何地，农民起义领袖都是一个模式，反动地主阶级又是一个模式。这说明，我们的研究工作在用史实套理论，用共性代替个性，用阶级性代替历史人物的个性，对具体的人的研究缺乏应有的深度。

第三、清末以来对清朝统治的传统偏见，在某些研究者的头脑中仍然存在，这种偏见视满洲为异族，只看到满族落后，野蛮的一面，因而引不起人们对人物研究的兴趣，公开的人物评价也因此受到影响。

第四、研究面狭窄。清代的中国是一个繁荣的封建社会，它有着士农工商各个阶层，满汉蒙回众多民族。可是，相当时期，研究者的眼光往往只集中在几个杰出历史人物身上，而且，就是对这几个杰出人物，也只注意其中几点或几个侧面，虽然一些论著比较精彩，但由于范围所限，总的说来，不能反映当时丰富生动的历史全貌，当然，对于起步不久的清史研究来说，这种情况原是很自然的。

到了十年动乱之时，清代人物研究更是陷于停滞和倒退，不过，这个责任主要不在我们的清史学者，而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

清代人物研究的第二次飞跃发生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和第一次相比，这次飞跃意义更大，因为它是思想解放的结果。经过十年浩劫，学者们对历史唯物主义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对封建主义、国家统一、民族关系、对外关系等重大历史问题有了更加成熟的看法，而且在学风上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人们不是脱离实际，空谈性理，而是扎扎实实做学问，通过辛勤的劳动，从文献史料中去发掘历史的真实。正是这次飞跃带来了今天清代人物研究的繁荣局面。

从七十年代末到现在，清代人物研究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有了较大发展。在这段时间，研究人员一方面继续发掘有关李定国、郑成功、康熙等传统研究对象的材料，并进行深入分析；另一方面，对雍正，范文程、洪承畴等人进行重新评价，力求公正、客观地分析其功过是非。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视野的开阔，一些边疆少数民族人物已开始引起人们的重视，关于渥巴锡、顾实汗、噶尔丹策零等人的专门论文也陆续出现不少。

随着人物研究的深入，有关人物的专著也随之出版发行。除了正在陆续出版的《清代人物传稿》外，几年来，已经出版的清代人物研究专著有：《努尔哈赤传》（阎崇年著）、《努尔哈赤评传》（滕绍箴著）、《清太宗全传》（孙文良、李治亭著）、《雍正传》（冯尔康著）、《皇父摄政王多尔袞全传》（周远廉、赵世瑜著）、《郑成功研究论文集》，等等。此外，还有一些知识性读物，如《乾隆》、《康熙》等。短短几年，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大大超过了以往三十年，这不能不使人们感到高兴。附带提一句，即将与读者见面的清史研究丛书、清代知识丛书也将从不同的角度反映清史研究取得的各种成果，其中不少涉及到清代人物研究。

从横向上看，建国以来已经取得的人物研究的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人物考证、论述、传记三种类型。人物考证，是研究者通过发掘材料，逻辑判断，澄清有关历史人物的疑点；人物论述，是对历史人物在某个时期或某个方面的历史活动或影响加以说明和评价；人物传记是要对历史人物的生平、活动和地位作全面的论述和评价。人物考证、论述和传记是层次不同的三种史学活动，三者互为前提，互相促进。比如，人物考证取得的成果，应当在人物论述和传记中得到体现，而在人物论述、传记中又会发现新的问题，从而推动研究者进行人物考证。

从学术界已经取得的成果来看，关于人物论述的成果最为突出。建国以来，共发表了近千篇关于清代人物研究的论文，其中大多属于此类。研究者们对清代人物的局部历史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评议，澄清了许多过去不甚清楚甚至模糊的事实。但是，这部分研究活动也存在着过分集中、重复劳动过多的现象。尽管这

些论著都各有其特点，但选题过分一致，不利于史学工作者充分发挥其才华，开辟史学研究的新领域。当然，这种状况也提醒我们，应当密切注意史学发展动态，及时交流信息。

和人物考证、论述相比，人物传记的成果要小些。建国以来发表的传记性论文、专著在数量上和基础论著相比，简直不成比例，且内容互相重复，缺乏新意。这种状况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因为人物传记能从总体上反映历史人物研究的水平。它不仅要求史学工作者具有深厚的史学功底，而且还要具有表高的文学和理论素养。人物传记不发达，势必限制人物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有关历史人物的理论也很难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还应当指出，建国以来，清代人物研究在范围上仍不够广，这既有资料受限这一重要原因，也还在于研究者视野不够开阔。虽然这几年大有好转，但仍有许多重要人物有待研究。例如，雍正以后，乾、嘉、道三朝过问者甚少，象鄂尔泰、张廷玉、于敏中、傅恒、福康安等重要人物基本上无人问津。这就使我们对清代中叶以后社会、政治的了解不能不具有很大的片面性。

总之，建国以来，尤其是近十年，清代人物研究总的说来，是蓬勃发展、卓有成效的。可以预料，在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无论是人物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还是具体的人物考述、评价，在不远的将来，都会有新的突破。

下面我们将对清代人物研究的状况作一些介绍。这里必须说明：一、我们的介绍只限于鸦片战争以前的清代人物，因为鸦片战争以后，习惯上归于近代史，它本身构成了一个庞大的体系，而且已有各种专题讨论介绍；二、即使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介绍也不可能囊括一切，因为就我们搜集到的附在书后的论文索引即

达千余篇（还不免有遗漏之处），涉及人物众多，我们所要介绍的只是其中的一部份，即站在舞台前沿、扮演着主角的重要政治人物。

二、对奠基者的探讨： 努尔哈赤与皇太极

从十六世纪末到十七世纪中叶，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二人，先后走到了政治舞台的前沿。在这半个多世纪里，他们代表满、蒙、汉贵族地主的利益，驰骋于辽阔的北土，跃马弯弓，东征西杀，积蓄力量，扩展势力，为大一统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努尔哈赤，生于明世宗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卒于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年）。明万历十一年，因祖、父被杀，以遭甲十三副起兵复仇，从此，开始了他的政治军事生涯。在此后四十余年中，他统一女真，编设八旗，创立后金、攻伐明朝，在东北建立起一个新兴的地区性军事强国，给明朝中央政权造成很大的威胁。可是，对这样一个在当时举足轻重的历史人物，过去，我们却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真正全面深入地考察努尔哈赤的历史，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

从已发表的论著来看，学者们对努尔哈赤的兴趣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努尔哈赤的历史地位问题，对这个问题，研究者一般持肯定态度，不过，强调重点互有差异。李鸿彬认为，努尔哈赤的历史功绩在于：“他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不仅消除了本民族

内部的分裂割据势力，统一了女真各部，而且，领导满族人民，英勇地抗击了明王朝的进攻，保卫了满族人民免受明朝统治者的奴役，同时还大力推行社会改革，促使满族由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这些卓著的历史功绩，对满族的进步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从而也为清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论满族英雄努尔哈赤》，《清史论丛》第2辑）。另一个研究者赵德贵和李鸿彬意见基本一致。他指出，努尔哈赤的历史功绩首先是完成了女真的统一，其次，才是促进女真社会的封建化；最后是促进了满洲共同体的形成（《努尔哈赤及其时代》，《社会科学战线》81年1期）。

阎崇年的《努尔哈赤传》除了肯定努尔哈赤统一女真，提高满族经济文化水平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外，还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例如，关于明清战争性质，作者认为，努尔哈赤领导的后金与明朝之间的战争，在萨尔浒之战后，性质即开始转化为争夺明统，进行民族掠夺的非正义战争；关于满族社会性质，作者认为，努尔哈赤为顺应满族社会发展趋势，采取了一些重大措施，加速了女真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特别是进入辽沈后，实行“计丁授田”、“按丁编庄”，从而逐渐形成一套军事封建土地所有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周远廉，还对努尔哈赤的另一面——不足的一面作过专门论述。他认为，作为满族形成的组织者，努尔哈赤确实是一个“卓越的政治家”，是“具有雄才大略，聪睿英勇的开国之君，对历史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但他也是某些蠢事的决策人，尤其是进入辽沈以后，努尔哈赤作了不少错事，实行了一些倒退的落后政策。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残酷屠杀辽东军民；二，大规模地编立农奴制拖克索，剥削量大大增加；三，确立了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制度；四，怀疑汉官，疏远汉官。

当然，对努尔哈赤的不足，特别是对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这一制度，究竟应当怎样评价，还值得进一步商讨。不过，周远廉对努尔哈赤弊政的分析，确实有助于我们全面评价这一历史人物，从而不至于失之偏颇。

第二、对努尔哈赤思想和政策的研究：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努尔哈赤具体的思想和政策。不过，由于这个工作涉及面很广，起步晚，许多地方尚待深入，这里，只作简单介绍：

陈澧于1983年在《辽宁大学学报》第五期上，发表了《努尔哈赤军事思想研究》一文。该文比较详细地分析了努尔哈赤在军事上的建树。首先在军队建设上，作者认为，努尔哈赤的指导思想“是从社会实际出发，从本民族的特点出发，走自己的路。虽然也继承前人的经验，但绝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而是在创造中求得发展和强大，这是一种具有朴素唯物主义色彩的建军思想。”其次，在战争主观指导上，作者认为，其战略战术指导思想是“伐大木岂能骤折？必以斧斤伐之，渐至微细，然后能折。”并指出，他的儿子皇太极也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夺取斗争胜利的。第三，在对战争的政治指导上，作者指出，努尔哈赤认为应当“以大义举之”，在“义战”的战争观指导下所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是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作者在文中总结说：努尔哈赤在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军队严格的组织纪律和战争的正义性质三者的统一方面有所认识，有所建树，“其军事思想为我国军事